

• 问题讨论 •

## 论批判学派与民国时期的科学论

### On the Critical School and the Science Stud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李醒民 / LI Xingmin

(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 北京, 100049)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摘要:** 批判学派的科学论对民国学人的影响巨大而深邃。民国学人不仅移译了马赫、彭加勒等人的相关著作, 而且汲取了他们的诸多思想, 并有所发挥或引申。尤其是, 民国纯学术派的代表人物任鸿隽、丁文江、王星拱与批判学派的思想联系十分密切。本文全景式地考察了这种影响, 并进而对其做出历史性的反思。

**关键词:** 批判学派 科学论 民国学者 历史反思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the critical school of science on schola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profound and far-reaching. Scholars of the period not only translated the relevant works of Mach, Poincaré and others, but also absorbed many of their ideas and made some development or extension. In particular,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epublic's pure academic school, Ren Hongjun, Ding Wenjiang, and Wang Xingong, have a very close ideological connection with the critical school.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is influence in a panoramic way and makes a historical reflection on it.

**Key Words:** Critical school; Science studies; Schol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ical reflection

中图分类号: B082; N031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01.015 CSTR: 32281.14.jdn.2026.01.015

批判学派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活跃于世界科学舞台的科学学派。<sup>[1]-[3]</sup>该学派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伟大哲学传统的继承者, 是前现代科学哲学的创造者和集大成者, 是现代科学革命(物理学革命)和现代哲学革命(逻辑经验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嚆矢和滥觞, 也是后现代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引线和酵素。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sup>[4]-[8]</sup>他们既是无愧于时代的伟大科学家, 也是名副其实的伟大哲学家或思想家, 即是我所称

谓的哲人科学家。在世纪之交, 批判学派的学说和思想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在当时是相当“现代化”的。批判学派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 而且在20世纪上半叶也给中国科学界和思想界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塑造了中国早期的科学哲学或科学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做跨学科的和多维度的研究和论说, 它包括科学哲学在内)。关于这一点, 我们既可以从对批判学派诸多论著的中文翻译得知, 也可以从中国科学界和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任鸿隽、丁文江、王星拱等与批判学派的思

收稿日期: 2024年5月7日; 返修日期: 2025年10月23日

作者简介: 李醒民(1945-)男, 陕西西安人, 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教授, 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Email: lixingmin@ucas.ac.cn

想相关和传承中窥见，还可以从民国学界对批判学派的重视、民国学人对批判学派的仿效以及部分学者对批判学派的毁灭性批判中获悉。民国时期的中国科学家和哲学家顺应世界潮流，立足中国本土，及时发现和汲取人类先进的精神成果，足见当时学人眼光之明锐、胸怀之广博、意识之前卫。这种观念传承和理论衔接使中国的学术活水迅速与世界学术潮流汇合，从而出现了民国时期中国科学思潮此起彼伏、科学论思想风起云涌的局面。

关于民国学者对批判学派代表人物论著的译述，中译本有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科学的价值》《科学与方法》《最后的沉思》，奥斯特瓦尔德的《文化学的能量学基础》和几本化学著作，皮尔逊的《科学的规范》等，但未见到有人翻译迪昂名著。民国学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尽其所能，锲而不舍，承担起学术引进、科学传播的时代重任，为中国的思想启蒙、学术繁荣和文化进步涂抹了一线亮色。他们续严复翻译之流风余韵，并进一步发扬光大：视野大大扩展，识别能力显著提高；译文由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并逐渐趋于忠实、流畅；名词和术语的翻译经过切磋琢磨，日渐准确；翻译规范逐渐确立，不断完善。但是，毋庸讳言，民国时期的译著或译文质量鱼龙混杂、良莠不一，水平参差不齐、判若云泥，并未达到期望的水准和高度——我们不必也不应苛求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前人。

批判学派对民国学人的巨大影响，由民国科学界的代表人物任鸿隽、丁文江、王星拱的科学论思想可以明显看出。任鸿隽与批判学派的思想关系相当密切：彭加勒的为科学而科学主张，科学的客观性、客观价值和真关系观点，科学的定义、方法、精神、功能、分类、定律等见解，对任鸿隽影响彰显。皮尔逊的《科学的规范》，特别是该书中科学与审美判断、科学的审美价值、科学的分类、自然定律等概念，在任鸿隽的思想留下深刻的印记。在20世纪初，任鸿隽的科学论之所以能够达到较高的水准，显然与汲取批判学派的思想息息相关。丁文江与批判学派的思想关联显而易见。丁文江

经常阅读马赫、彭加勒、皮尔逊的科学论论著，对他们三人十分熟稔。批判学派关于科学和反科学、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科学与形而上学关系的思想，对丁文江影响彰明较著。尤其是马赫的感觉经验论或要素一元论、皮尔逊的感觉论和怀疑批判精神，是丁文江知识论及其哲学基础的源泉。作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科学派的健将，丁文江从批判学派的思想宝库——尤其是《科学的规范》——中获益匪浅。王星拱与批判学派的思想关涉可谓千丝万缕。王星拱对马赫哲学的借鉴和吸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他不仅承袭了马赫的哲学思想（它并不是唯心论），而且在许多其他观点上也与马赫有不解之缘，比如思维经济、理论暂定、先前的记忆影响现在的经验、诸多事物只有量（程度）的差异而无质（本质）的区别、类比（类似）方法等。他也认同彭加勒的主导哲学思想经验约定论、关系实在论或综合实在论，以及有关思想——假设、简单性、直觉、科学美、科学发明的心理机制、自然的统一与科学的统一、科学基础不稳但旧理论仍有价值、为科学而科学、科学的精神价值、例外之应付和概率演算等。皮尔逊也是王星拱哲学思想的源泉，尤其是这样一些论说——感官和心智的类似建构基本相同的宇宙，感觉世界和概念世界。符号并非实在，科学的界定，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科学无止境，科学的未知、无知、能知和不可知，用科学反对迷信等——给王星拱以显著的启迪。王星拱之所以能够较早给后人留下两部名著《科学方法论》（1920）和《科学概论》（1930），显然与他善于吸收和消化批判学派的思想密不可分。

至于批判学派五位代表人物各自对民国学人的影响，尽管在程度上有所差别，总的来说还是普遍而深刻的。马赫的科学论论著风靡世界，为民国时期的学界所知悉。民国学人对马赫的学术贡献和哲学思想评价很高，对其科学论思想推崇最多的非思维经济原理莫属。此外，他们对于马赫的科学批判、因果律或因果性、科学摹写或科学描述思想也比较关注。民国学人对马赫哲学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现象论、实用主义、实证论或经验论、新实在论以至唯

心论。其实,马赫的主导哲学是感觉经验论或要素一元论,尽管也含有其他成分,包括民国学人没有怎么提及的理性论和约定论,但决不是什么唯心论或观念论。民国学人对马赫也有一些误解和曲解,而且对马赫没有全局性、整体性的研究,也没有针对某一专门论题的透彻分析,仅有一些局部的、零散的介绍或评论;对马赫丰富多彩的科学论贡献、斑驳陆离的思想风貌、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和古道热肠的人文情怀,也缺乏关照和领悟。

彭加勒是法国伟大的科学家和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四本科学论经典名著均有中译,光他的译名至少有56个,足见民国学人对他的关注和重视。在涉及彭加勒的文章中,既有对他的科学贡献和科学论思想的总评介,但多数是引用和发挥他关于科学目的和科学真理、科学方法和创造心理学、科学理论的要素和结构(事实、定律、原理三元结构)、科学哲学(包括数学哲学、科学与道德)的思想和论述。民国学人注意到彭加勒哲学中的约定论、经验论、理性论、实在论等元素,也有人认为他是观念论者。事实上,彭加勒的哲学决不是观念论,而是经验约定论和综合实在论——这是彭加勒的哲学创造,也是他的主导哲学思想。彭加勒哲学的特色在于其独特而微妙的多元张力特征——这不是前后不一或折衷主义,而正是其诱人魅力和强大威力之所在。民国学人对彭加勒的引用和评论连篇累牍,但是缺乏针对彭加勒的整体性的、全局性的宏观研究,也没有针对他的某一见解或观点的具体的、深入的微观研究。这主要是时代局限性,也与当时学人未能洞彻彭加勒思想的真知灼见、远见卓识,未能洞悉其真正价值、现实意义和历史地位有关。

就科学论的贡献和水准而言,迪昂丝毫不逊色于马赫、彭加勒和皮尔逊。可是,由于迪昂在学生时代推翻了学术权威贝特洛居功自傲的最大功原理,遭到这位大权在握者的打击报复,致使迪昂在生前和死后的半个多世纪都无法实至名归。因此,民国学人对迪昂的了解和评介不多,仅仅受到少数学人的注意,而且只涉及到科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假设和自然秩

序、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这几个很有限的论题,还误以为迪昂是观念论者。其实,迪昂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观念论的;迪昂哲学是以本体论背景上的秩序实在论、方法论文脉内的科学工具论、认识论透视下的理论整体论为网络,编织而成的斑驳陆离、别出机杼的多元张力哲学或多元张力论(pluralistic tensionalism)。中国学界与世界学界大体同步,从八十年代起才开始下工夫研究迪昂,陆续有论文和专著问世,弥补了民国学人的缺憾。

奥斯特瓦尔德论著连篇累牍、积案盈箱,使人目不暇接;思想丰富多彩、广博深邃,令人击节称赏。民国学人比较关注他的科学成就和科学论思想;除了一般性介绍外,也着重探讨他关于天才人物、文化科学研究和幸福公式的论述。尤其是,陈独秀等学人针对能量学与能量论的评论、阐释较多,充分肯定其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当然,也有人将其作为唯心论猛烈抨击。其实,能量论并不是唯心论,确切地讲是能量实在论;况且,它并不否认物质,也没有主张精神为第一性,反而把精神过程归结为能量过程,只是认为能量比物质更根本而已。总的说来,民国学人对奥斯特瓦尔德及其科学论的研究依旧缺乏整体观和全局观,即使在微观方面也很少见到有分量的专论。1980年代以后,这种研究状况才逐渐有所改变。

皮尔逊是20世纪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就其对中国学界的影响而言,皮尔逊与彭加勒难分轩輊。民国学人对皮尔逊既有一般的介绍,也针对科学的定义和目的,科学的方法、精神和功能,科学分类和科学定律,哲学或认识论思想,以及因果性或因果律概念,对形而上学、神学、迷信的反对和批判,对不可知论的反驳等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评介或探究。民国学人普遍认为皮尔逊的主导哲学思想是感觉论或实证论,确切地讲属于观念论的感觉论。不过,这种感觉论并不是前人感觉论的沿袭或翻版,而是有所丰富和创造,且与科学结合得十分紧密——我们不妨称其为科学的感觉论或科学感觉论。民国学人虽然对皮尔逊关注较多、评论不少,但是专门研究皮尔逊的论文或专著还是

难得一见。也是在八十年代，对皮尔逊研究才有所改观，有所进步。

不过，民国时期的某些学者从某些违背真相、缺乏深思的原则或教条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便对批判学派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无稽的大批判和毁灭性的掙击，所下的判断或所得的结论不是贴标签，就是扣帽子，不免因循千篇一律的套话，墮入陈陈相因的窠臼。他们竭力贬低和丑化批判学派，不知道批判学派在物理学危机和革命中实际上扮演的是革新派的角色。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给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哲学思想统统戴上唯心论或观念论的帽子，斥之为马赫主义、信仰主义或僧侣主义、陈腐哲学的招魂符，谴责其是荒谬的、没落的、恶俗的、布尔乔亚的、反动的、法西斯的。这一切无理批判和无端指控，与历史事实和批判学派的本来面目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sup>[9]、[10]</sup>这些学者的言行有四个显著特点：治学态度不严肃、不严谨；批判态度不端正；不是立足于事实，而是把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在科学、哲学、意识形态、政治之间未明晰划界，而将其混为一谈，从而铸就以讹传讹、一错再错的历史误会。

通过对批判学派与民国时期的科学论全景式的考察，通过对考察结果的反思式的沉思，我们不揣冒昧，斗胆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或一得之功。

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批判学派在民国时期对中国学界的深邃影响及其重大意义。批判学派的哲学思想虽然肇始于对19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危机的反应，但是由于他们深厚的哲学素养以及对科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机敏洞见和反思，他们在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同时，在哲学上也颇有创造和建树。比如，马赫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综合实在论以及科学方法论（假设、直觉等）和创造心理学，迪昂的理论整体论、秩序实在论以及科学理论的要素和结构的观点，奥斯特瓦尔德的能量论和科学方法，皮尔逊对感觉的透彻分析以及关于科学规范、功能、审美等见解，就是明显的例证。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它们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都产生了积极作用——既促进了科学发展，又丰富了哲学宝库。批判学

派代表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多元张力论思想——这是一种别树一帜、颇有特色的哲学。多元张力论能够在经验论与理性论、物质论与观念论、理性与非理性、归纳法与演绎法、传统与革新、现实与理想等等之间保持必要而微妙的张力，<sup>[11]-[13]</sup>因而超越了经典的科学论和科学哲学，适应了19世纪末物理学大变革的形势，为20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铺平了道路，也为196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科学哲学提供了理智资源和反思支点。要知道，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超越时代的智者：他们集前人哲学思想之精髓，融现代自然科学之精华，参个人天才思考之精粹，从而成为现代科学论或科学哲学的先驱、后现代科学论或科学哲学的先知。<sup>[14]-[16]</sup>尤其是，批判学派在民国时期对中国科学界和学术界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当时，中国学界和学人慧眼识珠，比较及时地与批判学派的思想接轨。这一对接使中国的科学论和科学哲学迅速与世界最新、最高的思想理论融为一体，从而出现了民国时期中国科学思潮较为活跃、科学论研究相对繁荣的局面。在中国现代科学思潮发展的进程中，在中国科学论研究的进步中，这无疑是一个醒目的、重要的里程碑。其时，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和中坚（任鸿隽、杨铨、胡明复、唐钺、秉志等），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代表（丁文江、王星拱等）先知先觉，身体力行，在引进、研究和发扬批判学派思想方面做出突出的贡献。他们汲取了批判学派的理论菁华，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多维度的透视：例如对科学的内涵、外延和特质的清楚认知，对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关系的正确把握；对科学精神的深入剖析，大力弘扬；对科学方法极为重视，肆力探究，并力图普及于社会；对科学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影响的深刻揭示；对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的强调与践行；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全面审视，看重其精神价值；对反科学思潮的辩驳和反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sup>[17]、[18]</sup>这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前辈、先哲，继承和阐扬批判学派的思想遗产，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对科学的反思已经达到时人能够达到的水准和高度。他们对科学在中国

社会落地生根,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国人心目中沉潜浸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批判学派代表人物的启蒙、自由、怀疑、批判、忘我追求真理等等精神气质,以及他们正直坦荡、开诚布公、知行合一等等品性,也不能不使民国学人萌生高山景行之情,力行见贤思齐之义。因此,不了解、不研究批判学派,既难以深刻洞察现代科学哲学的“来龙”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去脉”,也难以领悟和鉴赏民国时期的科学论和科学哲学,更无法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的起源、发展以及其时的时代精神气质。<sup>[19]</sup>

其次,我们要全面、公正、准确地估价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和研究水平。现在学界和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民国时期是学术大师云集、学术高峰迭起的黄金时代。我对民国学术整体没有研究,不敢率尔置喙、妄下雌黄。但是转念一想,这个时期正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换时期,所有学术门类、尤其是中国古代未有之新学科只能从引进、消化、吸收起步,就是积累深厚的国学也须借鉴新观念、借助新方法,方能进入发展、创造的新阶段。在这种状况下,除个别天才人物或个别研究范围有所集其大成或崭露头角外,中国学术在整体上想必不可能有惊人的飞跃或实质的改观或众多的创新。就我所研究的科学论领域或科学哲学学科而言,情况就是如此。这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专业研究人才稀缺,研究论著大都属于科学家的越界涉猎、纯粹哲学家或人文哲学家的抽象议论、学术爱好者的业余研究。也就是说,人们没有将及其作为一种特定的学问,作为一种独立的专门学科或领域来研究,即很少有针对某个专题或课题的专业性研究。对国外的科学论论著、特别是批判学派的主要著作的翻译不全面、不系统,缺失很多,而且翻译水平参差不齐,译文质量总体上不是

很高。对科学论的诸多题目没有专门探究,相关的专论或专著鲜见问世。对批判学派的各个代表人物几无专门的个案研究,对作为一个整体体的批判学派更是无人涉足,甚至不了解批判学派这个名称及其内涵。像任鸿隽、丁文江、王星拱等民国学人,他们虽然声名显赫、贡献良多,但是恐怕也很难被称为科学论或科学哲学大师,也没有长盛不衰、藏之名山、绝对堪称经典的科学论或科学哲学名著问世——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也许是一个例外。这样估价不是苛求前人和先贤——历史会记住他们的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精神——而是其时不争的事实。另外,民国时期学人的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观念相当淡薄,不了解、不重视、不遵守学术规范的事例比比皆是。他们引用别人撰写的文字或翻译的译文,大都不详细注明参考文献,甚至一点也不提及,就连剽窃抄袭这样的学术不端案例也可顺手掂拾<sup>①</sup>。<sup>[20]</sup>从民国时期的科学论或科学哲学研究的案例中,不难窥见其时学术水准和学风之一斑。

再次,我们要加强对批判学派和中国科学论或科学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在国外,对批判学派代表人物马赫的研究成果显著;对彭加勒的研究流于一般化;迪昂的论著从1950年代起才有英译本,对他的研究在1980年代渐趋活跃;对奥斯特瓦尔德至今似乎没有较多像样的研究成果;对皮尔逊真正有分量的研究好像还是一片荒漠。至于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批判学派的研究,时至今日仍未引起国外学界的密切注意或高度重视。在国内,情况也不美妙。民国时期的研究情况,我们已经知其研究概貌和学术水平。从1950年代起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有的只是大批判一类文字。这种状况在文化大革命十年达到令人惊悚的地步:“资产阶级科学家”和“反动学术权威”统统在批判、打倒之列,不仅触及其灵魂,而且摧残其肉体。这种

①在今日之学术界,剽窃抄袭这种恶劣的学术不端行为不仅没有收敛,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学术不端的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居然形成假论文订购、生产、销售、发表一条龙服务。对于种种学术乱象,我曾有诗描绘:“学界沉沦名利场,搅得鸡飞狗跳墙。争权夺利狼奔突,窃文钓誉鲫过江。鱼目胜珠已见惯,瓦釜毁钟亦寻常。何日清源更正本,澄我学人学问乡。”行文至此,我不能不慨然叹曰:长此以往,学将不学,人将不人,国将不国,伊于胡底?读者若对“中国学界的学术不端行为及其整饬之道”感兴趣,可参阅李醒民著《科学与伦理》一书。

状况到1980年代才逐渐有所改变,其中本人对批判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下工夫研究数十年,陆续发表和出版了诸多论著。但是,后续跟进的研究者寥寥无几,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这种状况与批判学派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中的突出贡献和历史地位极不相称,也有碍于对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的深究。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科学思潮和中国科学论或科学哲学发展史的研究方面,虽然有一些局部的或专题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是整体的、全局的研究似不多见。要知道,研究批判学派和中国现代科学论的历史,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不言自明;其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有目共睹:它有助于国人科学观念的更新,有益于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有利于科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成于科教兴国战略的落实,有效于中国科学事业的长远发展和不断进步。尤其是,它能够使科学精神深入人心,形成国人的科学心智框架或科学心态,成为真正的现代人,成为科学时代的新民。因此,加强对批判学派和中国现代科学思潮和科学论思想的研究,理应是顺势而为、势在必行的。

又次,要沿着正确的学术路向行进,按照学术研究规律从事研究,尽量杜绝非学术的东西侵入学术而起干扰和阻碍作用。在科学论或科学哲学领域,相当长时期内学术界对以马赫、彭加勒为首的批判学派以及所谓资产阶级科学家持批判态度;在不计其数的某些原著讲义和学习辅导材料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状况在1966-1976年间登峰造极,其批判调门越来越高,上纲上线愈演愈烈。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尽管错误的做法和陈旧的观点还不时顽固死守昔日的地盘,但毕竟江河日下、风光不再了。这里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1979年创刊的《自然辩证法通讯》陆续开设了科学方法论、科学学和科技政策、科学技术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专栏,1986年创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也相继开设类似的栏目;二是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修订研究生学科目录时,把“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从而实现了该学科在建制上的转换,并与世界学

术界接轨;三是从1980年代开始,原先属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的学人撰写和发表的论文,基本上都属于科学论、科学技术哲学或与之相关的范畴,陈腐的思维套路、研究取向和行为模式日渐式微。可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然辩证法真正实现了从旧范式(释经、革命大批判、以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与国外学术和学科没有交集或对话的空间)到新范式的巨大转变,<sup>[21], [22]</sup>出现了质的飞跃,由此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纯学术派的科学论研究进路衔接起来——这也是批判学派的研究路向和学术风格——并在孜孜矻矻、持之以恒的研究中做出骄人的成绩,达到较高的水准。<sup>[23]</sup>1980年代莘莘学子之所以小有成就的原因,在于物极必反的规律,思想解放的大环境,隔代亲传的机遇,学科交叉的殊性,人生阅历的丰富,心无旁骛的专一,孜孜不倦的钻研等等。<sup>[24]</sup>进入21世纪,《自然辩证法通讯》在2001年添加刊头语“连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纽带,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在2004年,把副标题由“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更名为“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和多维度透视的综合性学术刊物”。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在新世纪“科学技术哲学”向“科学论”——前者属于后者的一个分支学科或辖域——的历史性跨越,标志着在新世纪该研究领域扩大了新视野,进入了新境界。<sup>[25]-[27]</sup>

最后,我们呼吁科学与哲学联姻,科学家与哲学家结盟——这样既又利于科学创新,也有益于哲学进步。要知道,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科学大家,也是哲学大师。他们一身二任,实现了科学与哲学的天然融会,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自然贯通,从而谱写了科学史、哲学史、乃至人类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民国学人不仅汲取了批判学派的闪光思想,而且领悟和实践了他们的这一明睿进路和优良传统,促进了民国时期科学与哲学的传播和发展。遗憾的是,自逻辑经验论以来,科学哲学严重地脱离科学实践和科学本身,批判学派倡导和践行的科学与哲学的密切结合已成明日黄花——

哲学、尤其是科学哲学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功能,无异于动物学对鸟兽鱼虫的作用。先哲之风,山高水长;我辈后学,理当恢扬!

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民国时期,正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剧烈转型的时期。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思想和文化的吐故纳新和革故鼎新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其中伴随现代科学而引进的科学论或科学哲学,对当时中国社会转型和观念变革的所起历史作用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在21世纪面临新出现的又一大变局之时,发掘历史的智慧宝藏,汲取当年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当代中国和中国人回应时代召唤、顺应世界潮流之明鉴!

#### [参考文献]

- [1] 李醒民. 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1, 3(6): 30-38.
- [2] 李醒民. 论批判学派[J]. 社会科学战线, 1991, (6): 99-107.
- [3] 李醒民. 爱因斯坦: 批判学派科学哲学思想之集大成者和发扬光大者[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5, 27(1): 9-13.
- [4] 李醒民. 马赫[M]. 台北: 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 1995, xvii; 412.
- [5] 李醒民. 彭加勒[M]. 台北: 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 1994, vi; 316.
- [6] 李醒民. 迪昂[M]. 台北: 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 1996, xiii; 510.
- [7] 李醒民. 理性的光华——哲人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4, viii; 185.
- [8] 李醒民. 皮尔逊[M]. 台北: 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 1998, vi; 357.
- [9] 李醒民. 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A], 杨玉圣: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哲学卷(中)[C],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1247-1285.
- [10] 李醒民. 关于物理学危机问题的沉思——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某些观点的再认识[J]. 江汉论坛, 1985, (7): 12-19.
- [11] 李醒民. 论哲人科学家哲学思想的多元张力特征[J]. 学术界, 2002, (1): 171-184.
- [12] 李醒民. 哲人科学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特色——以批判学派和爱因斯坦为例[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4, 36(1): 13-19.
- [13] 李醒民. 从两极张力论到多元张力论[J]. 社会科学论坛, 2017, (8): 95-114.
- [14] 李醒民. 请君莫奏前朝曲, 听唱新翻杨柳枝——批判学派新论[A], 今日中国哲学[C],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6, 365-383.
- [15] 李醒民. 马赫: 维也纳学派的先师和逻辑经验论的始祖[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4, 16(5): 1-10.
- [16] 李醒民. 批判学派科学哲学的后现代意向[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5, (2): 79-84.
- [17] 李醒民. 五四先哲的睿智: 对科学和民主主义的洞见(上、下)[J]. 学术界, 2001, (3): 7-22.
- [18] 李醒民. 五四先哲的睿智: 对科学和民主主义的洞见(上、下)[J]. 学术界, 2001, (4): 67-80.
- [19] 李醒民. 批判学派与民国时期的科学哲学——在“中国科学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社会研讨会”上的发言[N]. 社会科学报, 2015-08-27(05).
- [20] 李醒民. 科学与伦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362-393.
- [21] 李醒民. 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J]. 民主与科学, 2009, (6): 22-24.
- [22] 李醒民. 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摘要[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0-13(05).
- [23] 李醒民. 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的学术水准——从《自然辩证法通讯》个案看[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8, 30(2): 102-103.
- [24] 李醒民. 追本溯源求长远——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研究范式急剧转换和学术水准迅速提升原因之探究[J]. 民主与科学, 2025, (3): 44-47.
- [25] 李醒民. 自然辩证法的新视野和新境界——《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150期寄语[N]. 光明日报, 2004-02-10(B2).
- [26] 李醒民. 自然辩证法的新视野和新境界——《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150期寄语[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4, 26(2): 1-3.
- [27] 李醒民. 自然辩证法研究应该拓宽视野和提升境界[J]. 社会科学论坛, 2010, (19): 80-84.

[责任编辑 李斌]